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和国民党营垒的分化,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和苏区建设工作的开展,表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但由于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在新的反“围剿”战争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

为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战争,蒋介石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在苏区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国民党政府聘请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当顾问,拟订作战计划;用美国、英国的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部队的新式装备。经过半年的准备,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

这时,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较前有所发展。尽管形势严峻,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敌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战争的成功经验,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此时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战争。在蒋介石正大力准备“围剿”的时候,1933年6月,临时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即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在国民党军队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把两个拳头分开来攻击敌的计划,只能徒然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结果是,东方军入闽作战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连续作战,造成部队非常疲劳;中央军则没有什么仗可打,被置于无

用之地。红军由此丧失了进行反“围剿”战争准备的宝贵时间。

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他们实际上是这次反“围剿”战争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之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苏区以外战胜敌人。这种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不能不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害。

9月下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堡垒之间,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此后,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的事变。中共临时中央如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战争将是十分有利的。但博古等害怕丢失苏区,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针,拒绝采纳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要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中共临时中央由于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坚持执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没有在军事上给予第十九路军的反蒋斗争以直接有力的配合,从而既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使红军丧失了借助这次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战争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战机。

正值前方红军鏖战之际,1933

年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按照这个决定,朱德、周恩来被调回后方。中央苏区的红军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直接由中革军委指挥作战。通过这一措施,李德进一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洲坝大埠村召开。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第一,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不利形势,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极力夸大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胜谁输的问题”,并断定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第二,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第三,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第四,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在党内和红军内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

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之后,重新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苏区中心区逐步推进,同时

命令粤军在南面对红军实行防堵。由于推行李德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用堡垒去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并且经常轻率地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发动进攻,舍弃自己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而去同强敌拼消耗。结果是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抵御,屡遭受严重损失。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博古、李德等命令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从4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向广昌发动进攻。参加保卫战的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英勇奋战,坚守阵地,付出很大牺牲。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会攻广昌。红军各部队依托阵地,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并实施“短促突击”战术,但未能摆脱被动局面。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命令红军撤离广昌。4月28日,红军退出广昌。广昌保卫战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而自身伤亡高达5000余人。这对以后红军的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后,分兵向根据地中心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红军又奉命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进一步陷于被动局面。

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了。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江西瑞金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一些省的代表。

博古主持会议,并作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了《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全会全面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并通过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最终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全会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及《致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电》《致德国共产党电》《致在狱同志电》《致工农红军电》等文件。

全会增选了王稼祥、凯丰(何克全)为中央委员,增选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孔原为候补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毛泽东等11人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等5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董必武任书记。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址。(资料图片)

寻乌罗塘谈判

1933年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100万兵力,调集200架飞机,筑起3000个碉堡,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蒋介石坐镇南昌,亲任前线总指挥。

1934年4月,敌人攻占广昌,闯进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与此同时,蒋介石居心险恶地怀着既“消灭红军,又吃掉粤军”的“一石两鸟”的阴谋,指令陈济棠从南面进犯中央苏区,企图打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南大门,威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准备长征前夕,根据朱德、周恩来指示,中央派何长工、潘汉年从会昌来到罗塘与广东军阀陈济棠代表杨幼敏等进行秘密谈判,谈判获得成功,并达成5项协议:一、同盟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通商;三、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四、我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相借道,各方战线后退二十华里。罗塘谈判的成功,为中央红军长征初期顺利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党我军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是我党统战工作的光辉典范。



寻乌罗塘谈判旧址。(资料图片)

中央红军突围长征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2个纵队,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和中革军委的部署,1934年10月7日至17日,参加突围转移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在于都贡江河畔集结完毕。以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两翼掩护,军委一、二纵队在中间,五军团殿后,部队历时9天,分别从于都县城东门等8个渡口过河。居中的中革军委及中央直属机关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被编入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从东门渡口,红三军团从南门渡口,红三军团及红八军团部分从西门渡口,红一军团从山峰坝渡口,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从鲤鱼渡口,红五军团十三师从石尾渡口,红三军团和红八军团各一部从孟口渡口,红九军团先后从珠兰渡口、渔翁埠渡口,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

“二苏大会”



近日,游客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旧址参观。 杨友明 摄

为适应国内形势的变化,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检阅政府工作,确立今后任务,1933年6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的决议。随后,成立了“二苏大会”筹委会,选举代表、工作报告和文件起草等准备工作开始紧锣密鼓进行。为迎接“二苏大会”召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沙洲坝新建一幢大礼堂作为会场,在瑞金叶坪兴建红军烈士纪念馆、公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馆、红军检阅台等纪念性建筑。

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

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列席旁听1500多人。除了中央苏区和红军及地方代表外,还有湘赣、闽浙赣、湘鄂赣、鄂豫皖等苏区和四川、上海等地代表。毛泽东致开幕词。1月24日至25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向大会作了两年来的工作报告。1月27日,根据代表们讨论的意见,毛泽东又作了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着重阐述了关心群众生活与注意工作方法的问题。1月31日,项英向大会作了关于宪法修改的报告。

大会代表听取并通过了朱德《关于红军建设》、林伯渠《关于经济建设》、吴亮平《关于苏维埃建设》等3个决议报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关于国旗国徽及军旗的决定》及《婚姻法》。会上,毛泽东主席还向兴国县、瑞金县和红三军团等先进单位颁发了奖状。2月1日,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等17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子恢等36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罗荣桓等35人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这次大会会期原定17天,2月6日闭幕。由于战事紧急,在大会选举完毕,会议议程大都完

成后,决定提前闭会。由毛泽东致闭幕词,并通过《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

2月2日,出席大会的部分代表参加在叶坪广场举行的红军烈士纪念馆等纪念性建筑的揭幕典礼。2月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任命了中央人民委员会各部部长。

“二苏大会”的成功召开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史上又一重大事件,充分证明“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拯救中国于沦亡,使全国人民得到彻底的解放”。